

中国唐史学会 论文集

中国唐史学会编

三秦出版社

中国唐史学会 论文集

(1991)

中国唐史学会编

三 秦 出 版 社

中国唐史学会论文集

(1991年)

中国唐史学会编

三秦出版社出版发行

(西安市湘子庙街12号)

◆

陕西省社会科学院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1/32开本 8.375印张 2插页 209千字

1991年9月第1版 1991年9月西安第1次印刷

印数 1—1000

ISBN 7—80546—357—3 / K·115

定价 3.80元

目 录

1978——1988年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评·····	吴 枫(1)
日本近十年来研究唐代史的情况·····	古贺登(18)
近十年唐代士庶问题研究述评·····	邓文宽(24)
近年来国内隋唐民族史研究述评(1981—1988)·····	周伟洲(48)
浅谈武则天研究·····	胡 戟(66)
唐五代江南经济研究述评·····	郑学檬(73)
《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历史·隋唐五代史》	

读后·····	黄约瑟(84)
评章群先生《唐代蕃将研究》·····	马 驰(97)
评两本研究唐代长安的专著·····	牛致功(113)
可敬的师长, 成功的著作——陶懋炳《五代史略》	

读后·····	王朝中(129)
简评《唐代妇女》·····	牛志平(135)
隋文帝杨坚的篡周阴谋与即位后的沉猜成性·····	胡如雷(144)
关于唐朝的“蕃望”制度·····	石见清裕(162)
元和中兴与吐蕃大食在中亚的冲突·····	孙永如(177)
唐代长安的纳课户·····	唐刚卯(190)
也谈两税的“量出为入”与“定额给资”·····	吴丽娱(203)
隋唐交通的特点及其历史地位·····	刘希为(213)
中唐后城市生活的“俗世化”趋向·····	林立平(229)
中古佛教寺院为社会文化中心说·····	谢重光(248)
后记·····	(265)

1978——1988年

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述评

吴 枫

1978年以来，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长足的进展，可谓人才辈出、成果丰硕。但同时也暴露出一些问题，需要加以注意并研究解决。兹就笔者所见，对这一时期中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基本状况及其发展趋势略加分析并述次如下。

一、研究队伍现状的分析

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的实力一向比较雄厚。特别是1978年以来，国内各高等院校历史系隋唐五代史教学与研究人员数量有较明显的扩充，一些高等院校和省市，还增设了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所、室，原有研究机构的力量也得到了不同程度的加强。因此，这一时期中，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迅速扩大。据不完全统计，到目前为止，国内从事隋唐五代史研究的专业人员总数约在400人以上。

这一时期中，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的素质有较大的提高。据估计，其中具有教授、研究员职称者约30人，占总数7.5%；具有副教授、副研究员职称者约100人，占总数25%；具有讲师、助理研究员职称者约180人，占总数45%。

从年龄结构来着，这一时期中，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年青化速度较快。高考制度恢复以后，一大批博士、硕士学位研究生、本科生充实到各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使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不断得到更新，平均年龄逐年下降。目前，国内隋唐五代史研究专业人员的平均年龄约在45—55岁之间。

从研究方向来看，原来那种片面重视政治史、经济史研究的倾向已经改变，文化史研究已经得到更为广泛的关注；隋史、五代史研究多年遭受冷落的现象也有所纠正。因此，这一时期中，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的力量配置渐趋均衡。据粗略统计，目前，侧重于研究政治史者约140人，占总数35%；侧重于研究经济史者约100人，占总数25%；侧重于研究文化史者约80人，占总数20%；从事其它方面研究者约80人，占总数20%。此外，侧重于研究隋史、五代史者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

总之，这一时期中，一支老中青相结合，结构合理、素质较好的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已经基本形成。

近年来，隋唐五代史研究队伍更新中的一个可喜的现象，是大批中青年人才崭露头角。他们功底扎实、思想活跃，在各自的研究领域中取得了显著的成绩。其中有代表性的是杨际平、牛志平、张国刚、任爽等人。

杨际平现任厦门大学经济史研究所副教授。近年来，在唐代经济史研究特别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书研究唐代土地制度方面成就突出，发表的主要论文有：《试考唐代吐鲁番地区“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2.1）、《吐蕃时期敦煌计口授田考（兼及其时的税制和户口制度）》（《甘肃社会科学》83.2）、《从敦煌户籍看唐代均田制下土地还授的实施问题》（《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3.3）、《和籾制度溯源》（《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4.3）、《从敦煌文书看唐代前期的和籾制度》（《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5.1）、《唐代户等与田产》（《历史研究》85.3）、《隋唐均

田、租庸调制下的逃户问题（兼谈宇文融括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6.4）、《魏氏高昌土地制度试探》（《新疆社会科学》87.3、87.4）、《再谈魏氏高昌与唐代西州“部田”的历史渊源》（《中国史研究》88.2）、《上海藏本敦煌所出河西支度营田使文书研究——兼论唐代屯营田的几种经营方式》（《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8.2）。唐代据以定户的资产是否包括田产，一直是唐代经济史研究中颇有争议的重要问题。杨际平在《唐代户等与田产》一文中，从历史传统、唐代田制、赋役制以及敦煌吐鲁番户籍等方面，论证了唐代据以定户的资产包括田产在内。他认为：实行租庸调和两税法时期，据以定户的资产均包含田产，并以田产为主。租庸调法以丁身为本，田产多少，户等高低，和每丁所应交纳的租庸调额无关，但与输租远近、兵役差役负担有关。而其后逐步出现的地税、户税和两税法，则与各户田产都有密切关系。从总的趋向来看，唐代农民赋役负担的轻重，与田产多少、户等高低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结论，使唐代户等与田产的关系的研究，大大推进一步。

牛志平现任陕西师范大学唐史研究所教授。近年来，在唐代文化史特别是婚俗方面的研究有所突破。发表的主要论文有：《从离婚与再嫁看唐代妇女的贞节观》（《陕西师大学报》85.4）、《唐代妒妇述论》（《人文杂志》87.3）、《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历史研究》87.4）、《说唐代俱内之风》（《史学月刊》88.2）；出版的著作有《唐人称谓》（三秦出版社）。在《唐代婚姻的开放风气》一文中，牛志平对唐代婚姻状况进行了总体考察。他认为：唐代处于封建社会的上升、繁荣时期，又属“开放型”社会，因此，婚姻制度表现出开放的特点。当时，禁锢人性的封建礼教尚未发展到后来那么严酷的地步，礼法束缚较弱，女性地位较高，贞节观念淡漠，民族通婚频繁，因此，青年男女具有择偶的相对自由，离婚再嫁颇显容易，夫妻关系不相禁忌、刚柔制

置。这一观点在史学界引起了一定的反响。

张国刚现任南开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近年来，对唐代政治史特别是军制、官制、藩镇割据问题作了深入的研究。发表的主要论文有：《武则天废监军制辨误》（南开大学学报80.6）、《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81.2）、《肃代之际的政治军事形势与藩镇割据局面形成的关系》（南开大学学报82.6）、《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83.4）、《唐代进奏院考略》（文史18辑）、《〈隋书〉两〈唐书〉百（职）官志校读拾零》（南开大学学报85.2）、《关于唐代兵募制度的几个问题》（南开大学学报88.1）。出版的著作有《唐代官制》（三秦出版社）、《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藩镇割据问题一直受到唐史研究工作者的重视。张国刚在《唐代藩镇类型及其动乱特点》一文中，从分析藩镇类型入手，概要地探讨了唐代各类藩镇的基本情况、藩镇与朝廷的关系及其动乱特色、动乱原因。张国刚把唐代藩镇分为河朔割据型、中原防遏型、边疆御边型和东南财源型4类。他认为，不应笼统将藩镇与割据等同，或将藩镇动乱一律视作割据、叛乱。唐代藩镇具有区域性与制约性统一的特点，因此，宋、明人有关唐代藩镇的言论值得重视。这篇论文是近年来唐代藩镇问题研究中的力作，值得研究者借鉴。

任爽现任黑龙江大学历史系副教授。近年来，对五代史特别是南唐史进行了独到的研究。发表的主要论文有：《南唐党争试探》（求是学刊85.5）、《吴唐禅代发微》（求是学刊86.4）、《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历史研究87.2）、《南唐时期江西的经济与文化》（求是学刊87.2）。唐宋之际的政治斗争一直是悬而未决的争论问题。任爽在《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一文中，从中国封建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的分析入手，揭示了南北两大地域地主阶级政治集团在政治态度、经济利益、文化传统方面的区别，并进而对永贞革新

到王安石变法三个世纪之间统治集团内部派系冲突的分野、斗争焦点及其历史根源、历史影响进行了深入、细致的分析。他认为，唐宋之际，南方社会经济与文化的迅速发展造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经济地理与文化地理的根本改观，同时给南北中国政治力量的对比带来了深刻的变化，从而使当时地主阶级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冲突表现出鲜明的南北分野的特色。这一认识把唐宋之际政治斗争的研究提高到了一个新的层次。

二、研究成果的估价

1978年到1988年，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据不完全统计，出版的专著约近100种，发表的论文在3,000篇以上。

这一时期中出版的断代史著作，有韩国磐《隋唐五代史纲》（增订本，人民出版社1979年）、吴枫、陈伯岩《隋唐五代史》（辽宁人民出版社1984）、陶懋炳《五代史略》（人民出版社1985）、王仲华《隋唐五代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王仲华大著《隋唐五代史》上下册百万余言，为其《魏晋南北朝史》的姊妹篇。作者历经六七年时间完成此书，反映了中国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最高水平。此书以其朴实流畅的笔调对本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作了全面的阐述，资料丰富，论据翔实，论文严谨，多有研究心得。如对均田府兵制的评价，作者认为这两种制度未在南方出现，只能在北方形成，说明它不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必然产物，而是由于十六国之后，鲜卑人进入中原，把他们先封建的村社残余形态带进北方，而出现了这种份地制度，又从份地制度上产生了府兵制度，顺理成章，对隋唐均田府兵制的研究颇有学术参考价值。书中除大量注文（如第三章第二节《租庸调制的破坏与两税法的实施》的注文中所征引的资料就

达一万余字）、图表都具有参考价值外，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有关文化部分，难能可贵，充分反映了作者对文化史研究的高度重视，对进一步研究隋唐文化很有借鉴作用。

这一时期中，隋唐历史文化丛书（三秦出版社）的编辑、出版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这是一套大型断代历史文化丛书，内容包括隋唐时期的政治制度、官吏制度、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教育、民族、外交、人物、事件和衣食住行等各个方面的专著、传记、资料、工具书，每一本将具体生动地深入阐述隋唐时期的一个专题，以学术性为主，兼有通俗性，尽量配以图片资料。这套丛书由宁可、沙知任编委会主任，张玉良、胡戟任责任主编。目前，已经出版发行的有10余种。其中叶栋著《唐代音乐与古谱译读》叙述了唐代音乐的流传和繁盛情况，并系统介绍了作者20年来研究敦煌琵琶曲谱和唐传五弦琴谱的成果。胡戟著《武则天本传》以生动、简洁的笔墨，勾勒了武则天一生的经历，对这位颇有争议的历史人物作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并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程志、韩宾娜合著的《唐代的州和道》是一本唐代历史地理的工具书。作者在占有大量历史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唐代地理文献，全面介绍了唐代州和道的设置、地理位置、沿革及变迁情况，对历史、方志、历史地理、古典文学的教学与研究有参考价值。牛志平、姚兆女合著的《唐人称谓》是一本有关唐代称谓的工具书，全书搜集唐代皇帝、后妃、皇室、官吏、百姓、亲族、夫妻、朋友等称谓800多条，并作了简单的引证和阐释，在分类诠释方面很有创见。张国刚著《唐代官制》是作者多年来研究唐代官制的成果。该书对唐代官制的源流、利弊作了较为深入的论述，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高世瑜著《唐代妇女》在充分搜集唐代妇女史料的基础上，分门别类地加以论述，全面地揭示了有唐一代各阶层妇女的历史活动，在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独到见解，开拓了妇女史研究的新领域。潘锦著《隋唐时期的

运河和漕运》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结合大量文献资料，全面论述了隋唐运河的历史沿革、开发利用、经济价值和历史作用，对过去研究中的讹误之处多有驳正，可供教学与研究参考。

这一时期中，隋唐五代史各方面的研究都取得了显著的进展。在出版的著作中，政治史、经济史、文化史方面的专著各占相当的比例。在发表的论文中，政治史论文约550篇；经济史论文约400篇；思想、文化史论文约400篇；中外关系史论文约150篇；民族、民族关系史论文约300篇；人物研究、评价论文约500篇。此外，科学技术史、史料考订、文献整理、考古文物、历史地理、研究方法以及工具书编纂等方面的研究也获得了大量的成果。

从总的情况来看，这一时期中，政治史、经济史方面的研究成果仍然居于领先地位。在政治史方面，各项制度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其中较为重要的论文，有唐耕耦《唐代前期的兵募》（历史研究81.4）、徐连达、马长林《唐代监察制度述论》（历史研究81.5）、张国刚《唐代监军制度考论》（中国史研究81.2）、吴枫、关大虹《中唐时期三省制度的削弱与变化》（东北师大学报82.2）、姚澄宇《唐朝政事堂制度初探》（中国史研究82.3）、吴宗国《科举制度与唐代高级官吏的选拔》（北京大学学报82.1）、《进士科与唐朝后朝的官僚世袭》（中国史研究82.1）、王超《政事堂制度辨证》（中国史研究83.3）、何忠礼《科举制起源辨析》（历史研究83.2）、高世瑜《唐代的考课制度》（东岳论丛83.2）、李光霁《隋唐职官制度渊源小议》（中国史研究85.1）、陈振《〈政事堂制度辨正〉质疑》（中国史研究85.1）、方积六《关于唐代募兵制度的探讨》（中国史研究88.3）等。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法制史的研究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就。出版的专著有杨廷福《唐律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2）、乔伟《唐律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1985）等。

在政治史研究中，藩镇割据问题受到了学者的重视。除出版的专著有张国刚《唐代藩镇研究》（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外，发表的重要论文有：杨志玖《论唐代的藩镇割据与儒家学说》（南开大学学报80.3）、《试论唐代藩镇割据的社会基础》（历史教学80.6）、杨志玖、张国刚《藩镇割据与唐代的封建大土地所有制》（学术月刊82.6）、李昌宪《五代削藩制置初探》（中国史研究82.3）、张国刚《唐代藩镇的类型及其动乱特点》（历史研究83.4）等。

关于隋唐五代的阶级关系、政治斗争，近年来出版的专著有李季平《唐代奴婢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牛致功《李渊建唐史略》（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吴枫、常万生《治世沧桑》（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同时还发表了一系列有份量的论文，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胡如雷《唐代牛李党争研究》（历史研究79.6）、王仲荦《〈唐贞观八年条举氏族事件〉残卷考释》（文史80.9）、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兼论唐代徭役的复除问题》（中华文史论丛80.3）、姜伯勤《敦煌寺院文书中“梁户”的性质》（中国史研究80.3）、瞿林东《唐代谱学简论》（中国史研究81.1）、汪征鲁《隋唐之际地主阶级的局部更新》（历史研究83.1）、齐陈骏、陆庆夫《唐代宦官述论》（中国史研究84.1）、任爽《唐宋之际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地域特征》（历史研究87.2）等。

这一时期中，农民战争史研究也取得了一定的发展。出版的专著有胡如雷《唐末农民战争》（中华书局1979）、方积六《黄巢起义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诸葛计《唐末农民战争战略初探》（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等。

在唐代政治人物研究方面，近年来成果卓著。出版的专著有：吴枫《魏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79）、汪篯《唐太宗与贞观之治》（求实出版社1980）、胡如雷《李世民传》（中华书

局1984)、赵克尧、许道勋《唐太宗传》(人民出版社1984)、傅璇琮《李德裕年谱》(齐鲁出版社1984)、袁英光、王界云《唐太宗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4)、吴枫、常万生《女皇武则天》(辽宁教育出版社1986)、郑英德《唐明皇全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袁英光、王界云《唐明皇传》(天津人民出版社1987)等。

在经济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出版了几部很有份量的专著,发表了一些很有见解的论文。特别是利用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唐代经济制度进展较快。出版的专著有:韩国磐《北朝隋唐的均田制度》(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中华书局1986)、张弓《唐朝仓廩制度初探》(中华书局1986)、姜伯勤《唐五代敦煌寺户制》(中华书局1987)、宋家钰《唐朝户籍法与均田制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88)。较为重要的论文有:姜伯勤《敦煌文书中的唐五代“行人”》(历史研究79.2)、唐耕耦《唐代的资课》(中国史研究80.3)、黄永年《唐代两税法杂考》(历史研究81.6)、黄盛璋《唐代户口的分布与变迁》(历史研究80.6)、武建国《试论均田制中永业田的性质》(历史研究81.3)、宋家钰《唐代的手实、户籍与计帐》(历史研究81.6)、《唐代户籍上的田籍与均田制——唐代均田制的性质与施行问题研究》(中国史研究83.4)、《从敦煌吐鲁番文书看唐代永业、口分田的区别及其性质》(中国史研究86.1)、王永兴《唐天宝敦煌差科簿研究——兼论唐代色役制和其他问题》(敦煌吐鲁番文献研究论集)、《关于唐代均田制中给田问题的探讨》(中国史研究86.1)、杨际平《唐代户等与田产的关系》(历史研究85.3)、陈衍德《唐代专卖收入初探》(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88.1)等。

在文化史研究方面,近年来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出版的专著中,以宗教与文学艺术为主,其中较为重要的有:范文澜《唐代

佛教》(人民出版社1979)、郭朋《隋唐佛教》(齐鲁书社1980)、程千帆《唐代进士行卷与文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傅璇琮《唐代诗人丛考》(中华书局1980)、汤用彤《隋唐佛教史稿》(中华书局1982)、任半塘《唐戏弄》(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刘国盈《唐代古文运动论稿》(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王达津《唐诗丛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卞孝萱《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郭绍林《唐代士大夫与佛教》(河南大学出版社1987)等。

这一时期中,文献资料的整理出版工作有了明显的进展。资料汇编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张泽咸《唐五代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79)、王永兴《隋末农民战争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0)、《隋唐五代经济史料汇编》(中华书局1987)、吴枫《隋唐历史文献集释》(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等。文献整理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唐长孺主编《吐鲁番出土文书》(文物出版社)目前已出版7册。点校注释方面的重要成果有刘俊文《唐律疏议》(中华书局1983)、季羨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唐耕耦《敦煌社会经济文献真迹释录》(文献出版社1988)等。《大唐西域记校注》是建国以来国内研究西域史地的一项重大成果。校注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对该书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校勘和注释,纠正了许多前人的讹误之处,并且就不少问题提出了新的见解,是一部集大成的研究著作,受到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评价。与此同时,王文锦等人点校的《通典》也取得了很大成就。点校者在吸收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参校各种版本,参考两《唐书》、《资治通鉴》、《文献通考》以及唐宋类书等多种文献,自1978年以来,前后校勘两次,校正明清本中讹误之处数千条,编写失误之处数百条,出校记近万条约60万字。此书远远超过目前国内流行的“钦定”本,为研究者提供

了一个最佳本。

除以上几个方面之外，中外关系、民族关系、史料考订、考古文物、历史地理等方面也都取得了显著成绩。这些成果不仅丰富了本学科的内容，为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创造了条件，而且作为文化积累，还将对社会的进步产生积极的影响。

三、发展趋势的反思

随着研究工作的深入发展，这一时期中，在研究领域、研究方法上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值得总结。

就研究领域来说，国内隋唐五代史学界大体上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解放以前，学者大多注意从微观角度开展研究。课题选择主要集中于一人、一事、一个问题。经过老一辈史学家的辛勤努力，隋唐五代史领域中许多含混之处得以澄清，许多错谬之说得以纠正，许多悬而未决的疑难问题得以解决。这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老一辈史学家为隋唐五代史研究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由于研究领域的狭窄，使得许多具体的历史问题得不到融会贯通、得不到理论升华、得不到宏观论证，因此也就难以更进一步研究这些具体问题。这种状况，大大限制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学者普遍重视从宏观角度开展研究。课题的选择基本集中于隋唐五代时期带有一般性的社会问题。经过这一代学者的辛勤努力，隋唐五代史领域中许多重大问题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隋唐五代史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要阶段，其历史地位、历史特点、发展规律得到了较为深入的揭示和论证，许多理论问题也得到了进一步的澄清。这是隋唐五代史研究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

中，新一代学者吸收了老一辈史学家的研究成果，把隋唐五代史的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但是，这一时期的研究同样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由于研究者片面注重一般性社会问题的理论论证，忽视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存在着严重的公式化概念化倾向，使得许多重大问题的论证缺乏足够的、有说服力的根据，往往在概念问题上纠缠不休。这种状况，同样也限制了隋唐五代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近年来，学者的研究角度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课题的选择既注意具体问题的微观研究，同时也重视重大社会现象的宏观论证。在微观研究与宏观论证的结合上，已经收到了显著的成效，在课题选择的广泛性与多层次性方面，已经取得了可喜的进展。从总的情况来看，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其它各方面的研究已经逐步趋于平衡；就某一方面来看，各个专题的研究同步发展。

以政治史的研究为例：这一时期中，阶级关系、政治制度、政治斗争、政治人物等各个专题的研究都取得了很大的成就。阶级关系的研究已经突破了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内部两大矛盾的局限，扩展到对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研究，深入到对各个阶层、各个集团的各方面特征及其相互关系的分析。皇族、士族、庶族、自耕农、佃农、商贾、手工业者、奴婢等各个阶层的政治态度、经济地位、文化素质、地域特征的研究已经有了相当大的进展；皇族与士族、士族与庶族、朝官与宦官、主户与客户、官户与形势户、藩帅与牙兵等特殊问题的研究也取得了显著的成绩。政治制度的研究已经扩展到对各项制度的各个侧面进行深入分析与综合考察。职官的设置、分类、沿革，机构的层次、职能、效率，官吏的选任、考课、致仕等问题的研究逐步深入。一些特殊制度如封驳、朝集、辟署，特殊机构如进奏院、都护府，特殊官职如使职、记注官等等，也取得了很多研究成果。政治斗争的研究特别是统治阶级内部派系冲突的研究已经突破了

根源、性质、影响的总体考察，对深入到各个派系及某些关键人物的具体分析。政治人物的研究已经突破了简单的阶级定性，扩展到对其历史、社会环境、经济地位、政治思想、性格特征、文化素质的具体分析与综合评价。

这种情况表明，近年来，中国隋唐五代史的研究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尽管这一阶段才刚刚开始，有许多新领域有待学者去开拓，有许多新问题等待学者去研究，但是，我们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就研究方法来说，国内隋唐五代史学界大体上也经历了3个发展阶段。解放以前，学者继承乾嘉学风，研究方法主要以资料排比、问题考证为主。经过老一辈史学家的辛勤努力与不断积累，形成了一套独具特色的研究方法。这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方法的第一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老一辈史学家把传统的史学研究方法推进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为隋唐五代史研究方法的科学化奠定了基础。但是，这种研究方法也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由于资料排比与问题考证仅能就某一具体历史问题的本来面目作出回答，就某一特定历史现象的演进线索进行勾稽，而不能就这些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作出深入而全面的综合与分析，因此也就不能从根本上揭示史实之间的相互关系，并进而揭示隋唐五代的发展规律，从而限制了隋唐史研究的深入发展。

解放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前，唯物史观被学者所普遍接受。学者注意从政治、经济、文化背景中研究重大历史问题、历史现象，特别重视用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以及阶级斗争的理论去研究，解释隋唐五代的历史发展规律。这是隋唐五代史研究方法的第二个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唯物史观在隋唐五代史学界得到确立，在某种程度上克服了解放以前研究方法过于拘谨的弊病。但是，由于学者没有很好地解决唯物史观与中国传统史学研究方法有机结合的问题，而是把